

〔唐〕白居易 著

白居易集

赋得古原草送别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白居易集



点 校 喻岳衡
责任编辑 丁双平
封面设计 许康铭

白居易集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1992年7月第1版 1997年1月第3次印刷
字数:940,000 印张:42 印数:15,501—20,500

ISBN 7-80520-314-8 / I·171

定价:(平)28.50元 (精)32.00元

湘新登字 007 号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长沙市韶山路158号 邮编:410004

前 言

白居易是唐代的一位大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及理论，在当时及后世并有深远的影响。他所处的中唐时代，唐王朝国力曾一度呈现复苏的转机，与当时国家形势相应，文坛上又形成百花竞艳、一片芳菲的景象。这时各种文体争辉，较之盛唐尤为壮观，而诗苑里亦涌起多种新的流派，在盛唐诗人光辉成就的基础上，开辟出各种新的道路。白居易继承杜甫的创作精神，以平易流畅的文辞，密切反映现实生活，形成一股新的诗风，在唐代诗坛上闪耀着特异的光辉。

白居易，字乐天，其先世为太原人，后徙居下邳（今陕西渭南市东北）。白居易于代宗大历七年（772年）出生于新郑（今河南新郑县），历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六朝，于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卒于洛阳，终年七十五岁。他于德宗贞元十四年擢进士，授校书郎。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对制策乙等，调周至（在今陕西省）县尉，其脍炙人口之《长恨歌》即作于此时。次年召入为翰林学士，三年拜左拾遗，对朝廷政事，多所规谏，其讽谕诗名篇《秦中吟》及《新乐府》等俱作于此时。元和五年，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九年冬，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十年（815年）七月，朝廷议讨藩镇，李师道与王承宗合谋，刺杀宰相武元衡于途，白居易首上疏，急请捕贼以雪国耻，执政恶其越职言事，诬以非罪，贬为

江州司马。白氏于此写出其另一名篇歌诗《琵琶行》及论诗的重要文献《与元九书》。元和十三年（818年）冬，量移忠州刺史。次年冬，拜司门员外郎。元和十五年转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穆宗长庆元年（821年），转中书舍人。次年，以主昏相庸，言不见听，自求外任为杭州刺史。长庆四年（824年），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复出为苏州刺史。文宗大和元年（827年），召为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大和三年，求分司东都，除太子宾客。大和五年，除河南尹。大和七年，复授太子宾客分司。大和九年（835年）甘露之变，士类寒心，居易愈无宦情。文宗开成元年（836年），除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进冯翊县侯。武宗会昌初（841年）以刑部尚书致仕，会昌六年（846年）卒。居易常持“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之志，当元和之初，见宪宗在政治上欲有所振作，常直言极谏，希于国家有所补益，及因言事贬谪江州，遂一改往态，惟事委顺随遇，知足保和。故当朋党狂潮鼓荡，士大夫鲜不波及时，居易独超然物外，同时与两党友人并有往还，如与李绅及牛僧孺各自以诗相唱和，牛当国时，绝不因之有所希进，胜于元稹之苟竞禄位远甚。

白居易的诗歌，现存约近三千首，数量之多，在唐代诗人中高居首位。他在自己编集的《白氏长庆集》中，将其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律诗、杂体、格诗、歌行七类，在性质上不免混杂。因为前三类是就诗的内容分的，而后四种则是就诗的体裁分的，这样分法就很不一律。实际上不过是前三类属于古体，后四类属于近体。即以内容分的感伤诗中，有些整个

诗中的情绪，也很难找到感伤的性质，如《新栽竹》：

佐邑意不适，闭门秋草生。何以娱野性，种竹百馀
茎。见此阶上色，忆得山中情。有时公事暇，终日绕栏
行。勿言根未固，勿言阴未成。已学庭宇内，稍稍有馀
清。最爱近窗卧，秋风枝有声。

这首诗除了首句略带宦情，全是“娱野性”的抒写，充满着一片“闲适”之情。感觉不到什么感伤的影子。这种情况，诗中还多，不必再举。总的看来，还不越古体、近体两大类，我们可从多方面来探索。

他的诗歌成就最辉煌而受到普遍重视的，乃是讽谕诗。其中主要的为《秦中吟》及《新乐府》。《秦中吟》为五言古体十首，前有小序云：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这十首诗所写，确为诗人直接感触到的长安社会现实现象，其现实性很强。它的内容，除了涉及许多社会不良风习，其讽刺锋芒，更直接指向政府官僚。其中《重赋》及《轻肥》二首，揭露出政府对农民的残酷压榨，及宫廷内臣生活之奢侈，可谓淋漓尽致。难怪“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与元九书》）了。至于其《新乐府》七言古体五十首，则为其精心结意之作。诗前有序，表明其创作在形式上“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意”。说明创作意图，则“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全诗以《七德舞》始，以《采诗官》终，以见本于古诗人美刺之意。至于

五十篇中的内容、涉及时间及范围，则极为广泛，从唐朝开国直至当代，举凡政治得失、君臣善恶，以及社会风习，悉纳入歌咏。其中如《杜陵叟》、《卖炭翁》、《红线毯》、《缭绫》诸篇，皆直刺现实弊政，申诉出人民遭受的苦难，其中凝集着人民的无限血泪。《杜陵叟》所咏，即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事，这年京兆大旱，而京兆尹李宽奏言：“今年虽旱，而禾苗甚美”，“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至坏屋卖瓦木麦苗以输官”（《通鉴》卷236）。《卖炭翁》所描写的宫市之弊，亦德宗时事（具见《通鉴》卷235）。《缭绫》中有句云：“去年中使宣口勅，天上取样人间织。”《红线毯》中有句云：“宣州太守加样织，自谓为臣能尽力。”可知这几篇乃是显对当时弊政而发，诗人笔锋是非常锐利而无所畏惧的。他如《上阳白发人》、《新丰折臂翁》、《缚戎人》诸篇，则表达了无告者的沉痛心声。篇中有些涉及边地的，如《城盐州》、《蛮子朝》、《骠国乐》、《西凉伎》、《阴山道》等，反映出诗人对边地形势及对外关系的各种看法。也有许多篇章是针对社会不良风习的，如《母别子》、《时世妆》、《杏为梁》、《井底引银瓶》等。也有立意颂美的，如《七德舞》为颂太宗创业之功，《青石》及《道州民》乃颂美忠直之臣，并意在激励当代君臣，于颂中寓有针刺之旨。然其中关于音乐的篇章，一意崇古非今，显得保守陈旧，不过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自古文人尊古卑今，是古非今之论多矣，实则对外之宣传，未必合于中心之底蕴也。”（《元白诗笺证稿》162页）观白氏许多描写音乐演奏的诗篇，充分流露出对当时流行乐曲的赏爱之情，似白氏于此所发是古非今之论，确为“对外宣传”之门面语，“未必合于其衷心之底蕴”的。再如

《捕蝗》中所发的议论，更是陈腐不堪。他认为是所谓阴阳和气损伤所致，反对捕杀蝗虫，只有良吏以善政驱之出境，这些话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实未免迂曲，这与其文学艺术观的步调亦有相协之处。

与白居易同时作《新乐府》的有李公垂和元稹。李公垂的作品已失传，元稹的作品今仅存十二首，很少被人谈到，实因其感人力量远不能与白作比。元、白为当时诗坛齐名的好友，彼此酬唱甚多，元作的十二题，均在白的五十首中。陈寅恪先生曾在其《元白诗笺证稿》中，对二家的《新乐府》作了比较，认为“元氏诸篇所咏，似有繁复与庞杂之病，而白氏每篇则各具事旨，不杂亦不复”（122页）。试以二家的《上阳白发人》为例，确如陈寅恪先生指出的，元氏所作，“有繁复与庞杂之病”，白氏所作，则事旨极明。再进而细加分析，白作主题集中，从首到尾，把主人公从少到老的生活经历及情绪抒写得淋漓尽致。在叙写中，有大笔，有工笔。“玄宗末岁初选入”至“零落年深残此身”，及“莺归燕去长悄然”至“东西四五百回圆”，皆大笔也，其中包含多少情事，给读者无限想象余地。中间写入宫经历，及宫中长年生活情绪，则工笔也。诗人以大笔的概括，工笔的细写，全面的活现出这位上阳宫人不幸的一生。“今日宫中年最老”至“天宝末年时世妆”，以诙谐调侃的语气说来，其中隐含着多少血泪辛酸！再看元氏所作，全篇意思很零散，没有中心，看不到一个具体主人公形象。语言亦不如白之精纯流畅，故而缺乏感人的效果。白作全篇语气顺当，好象信手写出，却极纯练和雅，与其情节结构，都是极费了匠心的。白氏的整个《新乐府》篇章，都同样具有这些艺术特色。

在白居易的讽谕诗中，除了《秦中吟》十首及《新乐府》五十首外，还有如《读张籍古乐府诗》，极口称赞张籍古乐府诗的社会意义，也是为自己的诗歌主张张目，《孔戡诗》则痛直臣之早死而未及见用，《观刈麦诗》、《采地黄者》悯农民之穷苦，《题海图屏风》讽刺对势要者不可触犯，《宿紫阁山北村》反映出神策军之横恣，《云居寺孤桐》、《折剑头》同为示人以立身之道，这些都具有较高的现实意义，属辞亦颇警策。

白居易的诗歌之最为读者赏爱的要数《长恨歌》及《琵琶行》二篇。关于《长恨歌》，过去在其主题思想上有过热烈的争论，到现在还有余响，仍是莫衷一是，似乎只能是见仁见智的了。这首歌诗是他作周至尉时，与家居周至的朋友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时，话及明皇、杨妃之事，受王的怂恿而作，同时人陈鸿又为之作《长恨歌传》，二者相辅流传于世。读《长恨歌》，辅读传文，对于理解诗意是有裨益的。陈鸿在其传文的末端说：“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独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这里所说的“感其事”、“垂（戒）于将来”，给了读者重要的启示。

我们读《长恨歌》，很容易被它的情节所吸引，这些是本诗的胜场。前面极写杨妃“扬蛾入宠”之得意情状，直觉是春风骀荡，春色无边。“回眸一笑百媚生”，活现出光艳之极的美人神态，真是化工之笔。继写马嵬事变，又觉繁红扫地，春色遽尽。续写蜀道、行宫及重经马嵬而归到南内，其间种种情景，皆人生所极难堪者。诗人以其生花之笔，一路如此写来，实贯注了深刻的同情，也自然地感染了读者，随之悲欢。随后至终一大段写方士上下求索，幻出玉真接见汉使，以至临别致

词，结出长恨题旨，读来只觉馀情袅袅。其中妃子形象，劫后重现，“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对照初入宫时，“回眸一笑百媚生”，真觉春秋异象，仙凡殊致。如联系着传文合看，可从中得到许多启示，丰富我们对诗的理解。如对杨妃之入宫，传文如实道出，乃高力士潜搜外宫，得之于寿王邸。寿王瑁为玄宗之子，是玄宗夺取了子妇。而歌诗却说：“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在这点上，诗人不得不曲为之饰，如果直笔写出，就会大损杨妃形象，大大削弱全诗的艺术效果。而诗人让陈鸿于传文中明白叙出，则表明诗人并非是谎言欺世。歌诗有云：“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形容出杨妃得宠之盛。这当由其有“回眸一笑百媚生”之艳丽，而传文中说她于册为贵妃后，“由是冶其容，敏其词，婉变万态，以中上意，上益嬖焉。”又说，非徒殊艳尤态致是，盖才智明慧、善巧便佞，先意希旨，有不可形容者。这些都可补助对于诗句的深入理解。据史载她曾两次触怒明皇而被驱遣出宫，并随即迎回，宠爱因之加深，可见明皇生活中非有她不可的了。歌诗中有云：“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两句说明皇有了杨妃，便耽于淫乐，怠于朝政，寻常生活的叙写，在全诗中至关重要。这是事实，正是致乱之由，所以不免“长恨”之因。据《通鉴》三载的记载：“上从容谓高力士曰：‘朕不出长安近十年，天下无事，朕欲高居无念，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事实上他已将政权交给李林甫，任其诛锄善类，一手遮天，后来杨国忠接着，甚至掩盖对南诏用兵的败状，使玄宗毫无所知。像这样国家能不出乱子吗？诗中说出的“从此君王不早朝”，在与杨妃欢乐生活的叙写中，轻轻暗示出国家的危机，伏下明皇

杨妃人生悲剧产生的因由。总观全诗，诗人在其中流注的情意是复杂的。玄宗沉溺色欲，荒怠国政，酿成国家大乱，事实历历，足为殷鉴。诗人直书其事，读者于中可以得其微旨，陈鸿遂于传末淳淳致意，即所谓“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然明皇以天子之尊，自酿祸乱，失去所有，而杨妃以色情邀宠，惑主败政，终致身弃路侧，其事甚有足悲。诗人固“多于情者”，不能不深“感其事”，故歌来无限悲悯，不觉感人之深，遂亦如汉赋之效应，“讽一而劝百”了。

《琵琶行》是他于被贬江州的次年，即元和十一年（816年）创作的。诗前有序，约略叙说了写本诗的来由，秋夜送客江头，听了琵琶妇的演奏并自述其身世后，感念到自己的处境，“是夕始觉有迁谪意，因为长句歌以赠之。”诗人在其中以精切的语言描写出琵琶妇高超的琵琶演奏技艺，及其盛衰翻覆的身世，因而产生与其一致的天涯沦落之感。所有描写、叙述及感慨的抒发，俱从切近的现实生活中来，故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整个琵琶演奏过程的描写，使读者俨如身临其境。所有声音的疾徐、高低、大小，以各种事物作恰切的形容，并间而点出对其中情绪的领会，使读者不自觉地被带入一场令人忘我的音乐氛围中，成为以诗歌描写音乐演奏的绝诣。接着通过琵琶妇的自述，描出她年少时的春风得意，及时移世易后的老大凄凉，活现出她生活的今昔盛衰变化之惨遽。末端总应上两层，道出诗人听了琵琶妇的演奏及其自述后产生的激情，整篇声情事义，绾合得至为饱满。结合诗人的过去经历，我们可以理解诗人所以如此感慨深重的来由。诗人自己在朝时，为了反对弊政，与君主及大臣抗争朝堂，而今却寂寞地僻处江城，今

昔盛衰之况，正与面前伊人一致，故遂引为同调，“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正因感慨之深，亦不嫌比拟非类了。在诗中，我们看到这位女艺人从开始露面到最后终场的一系列行动及在行动中流露出的心理状态，和适当点缀其间的时节景物，都表明诗人善于运用细节，构成人物形象的完整性，及给读者以生动鲜明感的艺术手法。和《长恨歌》相比，《琵琶行》显示着更深厚的艺术功力。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除了以上论到的《秦中吟》、《新乐府》和其它一些讽谕诗，以及二首七言歌行名篇最为读者注意外，其它古近体诗数量还很多。那些诗从其内容言，大致不外乎感伤和闲适两方面生活情绪的抒写。诗人自贬江州后，一变自己早年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一味独善其身，知足保和，诗风也随之而迥异，以往那种干与时政的尖锐笔锋，全都收敛起来，吟咏所及，不越个人的生活景况及情绪，和与朋友交流情感的酬唱，以及山川胜迹的观游。在诗人的这类创作中，我们可具悉诗人一生的经历和体现在诗中的情绪。这些虽都是从其生活实感中来，但由于所咏的生活内容都很凡近，情思不免有所局限，因而颇乏高远思致。如其《南亭对酒送春》、《白牡丹》等篇，都不免浅俗，它如《知足吟》、《慵不能》、《嗟发落》之类的诗篇，集中多有，吐属的辞句，都是随手可拾的，语意并较平常，不似读李、杜诗篇，自觉意味新鲜。诗人自贬谪江州，在政治上一度蹉跎，生活及政治态度一反既往，惟事独善其身，知足保和，故虽当时政治风波不断翻覆，而诗人无所干与，故自忠州归后，宦途一帆风顺，官至从二品，寿至七十五岁，在唐代诗人中是少有的。然其全部诗的质量，亦不能

与李、杜比。但中唐政治上一次大的事件“甘露之变”，对诗人的情绪还是有所触动的：

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

《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其日独游香山寺）

秦磨利刀斩李斯，齐烧沸鼎烹郈其。可怜黄绮入商洛，闲卧白云歌紫芝。彼为菹醢机上尽，此为鸾皇天外飞。去者逍遥来者死，乃知祸福非天为。

《咏史》（九年十一月作）

文宗大和九年（835年），宰相李训与朝廷部分大臣谋诛宦官，诈言金吾仗舍石榴树有甘露，请帝及内官往观，就除中尉仇士良，事机败露，宰相李训、王涯及朝廷大臣十馀家皆被族诛，史家称为“甘露之变”。此事发生在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白居易曾有诗二首咏此事，前首即以事变发生之年月日为题。诗的首尾二联，俱以感慨人生祸福为起结，祸福虽不可知，而早退可免。麟龙虽高贵，终为脯醢，不如龟之自由曳尾泥中，以喻高位之危，不如下僚之自在。次联以己与王涯等人此日所临景况作对比，此日己方独游山寺，而王涯等人正同被送往刑场诛杀。“白首同归”用潘岳赠石崇诗语。潘岳与石崇等众家，被孙秀所诬陷，同日被戮，临刑，崇谓岳曰：“可谓‘白首同所归’矣”。白诗用以比况王涯等人此时处境，极为恰切。五六两句用嵇康及李斯临刑时语事，悲叹其被杀之急遽。白居易贬江州时，初拟为刺史，王涯以为罚轻，乃降为司马。于是有人以为白此诗有幸灾乐祸之意，东坡为之辨解说：“乐天岂幸

人之祸者哉，盖悲之也。”汪立名以为是“悲涯之祸而幸己之不与”，应是允当的。（汪立名《白香山年谱》大和九年谱）次首《咏史》题下标“九年十一月作”，显然表示本诗的用意所在，与前诗所咏的主题是一致的，但全借秦汉间人事为题材，以慨叹当时人事。诗以首联与次联不同人事遭际相对照，第三联分别重申一、二两联所言两种命运。末联结言祸福由己。两种人生祸福，亦是针对王涯与己而言。但“彼为”句与首二句未免意思重复，殊为病累。

在白居易的全部诗中，七律的数量相当多。他的七律，无盛唐人之雄浑高华，亦不似大历间人之洁练省净，而以平易流畅出之。其钱塘湖上诸作，是其较为读者赏爱的。在诗人随手轻便的叙写中，即将读者带到西湖美好的自然景观中。其《余杭形胜》一首极真切地摄取下杭州形胜的概要。而《钱塘湖春行》又活画出西湖春日风物之妍丽。《西湖晚归》则绘出湖上游乐中丰富的景色。从中也可看出诗人的游履集中在西湖东面孤山一带。“绿杨阴里白沙堤”，当即是白氏所筑连接孤山至湖东岸的白堤，这是白氏永留在杭州的遗爱。

七言绝句在白氏集中也不少。七绝要语近情遥，有含蓄不尽之味。白氏所作，一般由于属语率易，意味易尽，少含蓄之趣，但也有一些较难得者，如宫怨诗《后宫词》写一位宫中失宠的女性。她所处的环境气氛，她的生活情态及心理活动，极生动亲切地呈现在读者眼前，通篇二十八个字，无一闲散，精工至极，达到了盛唐此体的艺术高境。《燕子楼》题下原有一段较长的序云：“徐州故张尚书（建封）有爱妓曰盼盼，善歌舞，雅多风态。……尚书既没，归葬东洛，而彭城有张氏旧

第，第中有小楼名燕子，盼盼念旧爱而不嫁，居是楼十馀年，幽独块然，于今尚在。予……因作三绝句。”《燕子楼》的第一首描写盼盼独处楼上的环境气氛及心情，备极凄凉难堪。后二句含蓄地道出她难堪的心态。李白《长门怨》句云：“夜悬明镜青天上，独照长门宫里人。”白氏此二句可谓与之异曲同工。第二首从舞衫的闲置及主人公对舞衫的表情，反映她生活之凄寂及情志之坚贞。第三首从传闻尚书墓木之长大，以见盼盼情志坚贞之不易。从尚书墓木看，盼盼早应成灰，然“于今尚在”，其志足钦，其情堪悯矣。三诗称合主人公之情志，布景设色，衬映出主人公贞纯的生活情态，语极含蓄，故感人效果极强。此诗为和张仲素原题而作，三首全依原韵，极尽才思，大胜原作。

白氏七绝诗中还有值得注意的，乃是带有民歌情调的《杨柳枝词》及《竹枝词》。试观如下所录：

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西角荒园里；
尽日无人属阿谁？

六么水调家家唱，白雪梅花处处吹。古调旧曲君休听，
听取新翻杨柳枝。

红板江桥青酒旗，馆娃宫暖日斜时。可怜雨歇东风定，
万树千条各自垂。

叶含浓露如啼眼，枝袅轻风似舞腰。小树不禁攀折苦，
乞君留取两三条。

《杨柳枝词》

瞿塘峡口冷烟低，白帝城头月向西。唱到竹枝声咽处，
寒猿啼鸟一时啼。

竹枝苦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愁杀江楼病使君。

《竹枝词》

《杨柳枝词》第一首为白氏有所为而作。《本事诗》曰：“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年既高迈，而小蛮方丰艳，因为杨柳之词以托意。”这里“一树春风”云云即为小蛮作。前二句以杨柳枝条芳菲繁茂比喻小蛮之年华丰艳，后二句点明杨柳树所在处，以见其实堪系念。因“永丰坊西南角有垂柳一株，柔条极茂也。”（《乐府诗集》卷81《杨柳枝》二首解题）第二首表明《杨柳枝》为新翻曲，可以代替古歌旧曲。六么、水调、白雪、梅花皆旧曲名。晚唐人薛能谓“《杨柳枝》者，古题所谓《折杨柳》也”，（见同前引）可知此曲“新翻”之由来。第三首从一定的地点、时间、气象的交织中，描写出杨柳树的形象，在读者眼前呈现出一幅鲜美清静的江南时节风物图画。第四首描写的宛然似一位风尘弱女的情态，诗人于叮嘱中深致怜惜之意。《竹枝》乃刘禹锡改创的歌曲。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一“近代曲辞”《竹枝》题解云：“《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白氏本题共有四首，俱是和刘禹锡歌辞而作。《竹枝词》不同于《杨柳枝词》之即物即人地以描写杨柳本体为主旨，而是广泛地歌咏人的生活情感，如众所熟知的“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便是刘禹锡《竹枝词》中的一首。白氏的本题四首，全是闻唱《竹枝》的感受，从这里选取的二首，诗人叙写其感

受的声情，可知其音调之凄苦动人，唱和者众多。白氏这四首诗当是在忠州时写的。《杨柳枝》和《竹枝》俱词气清新，有民歌的气质，而《竹枝》更有较浓厚的巴渝地方气息。

在白氏的诗歌创作中，还有须提到的，就是一些长篇巨制，如五言长古《游悟真寺》及《和梦游春诗一百韵》，五言长律《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及《东南行一百韵寄通州元九侍御……校书》等篇，还有许多动辄数十韵的。这些诗篇，情思辞藻，俱极丰丽，诗人为了逞才争胜，故皆极具匠心，穷事精工，虽长至百馀韵，读来不以为累。这类篇章，也是元、白唱和的胜场，所以元稹在所作老杜墓志铭序中过崇老杜排律云：“铺陈终始，排比声律，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对于老杜，只区区着眼于其排律之工，所以元遗山嘲他“争奈微之识馑馑”，实则元之本意乃为他与白氏这类作品高自标置。从这些感到，在白氏的全部诗中，有一种很不平衡现象：我们读他的所谓“闲适”、“感伤”以及许多律绝诗，一般总感到直率平庸，缺乏感人的艺术力量，似觉太不经意。但读到他的《秦中吟》、《新乐府》、《琵琶行》等以及一些长篇，如适才提到的五言长古与五言长律，则又不禁服其才气横溢，辞意精工。同一诗人，表现如此，看来只在其措意与不措意，亦即老杜所说的“苦用心”与否。如其《燕子楼》三首之艺术魅力强，乃为与张仲素原作争胜，元稹之《梦游春诗》只七十韵，而白氏和诗多至一百韵，因为元、白好友，总是在诗歌创作上有意争高，故动起笔来必然是竭尽才思的。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主张，也是我们进行全面研究的一个重